

DOI: 10.19327/j.cnki.zuaxb.1009-1750.2024.01.005

羽卫黄昏：崇祯朝与南明时期勇卫营研究

吴志远, 蔡杰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勇卫营设置于明末崇祯年间, 由四卫营、勇士营改编而成, 是崇祯帝即位后京营改革的关键一环。勇卫营虽称天子禁卫, 却常年四方作战, 或北御清兵, 或南征流寇, 战果颇著, 是明廷倚重的重要军事力量。崇祯十五年(1642年), 督理勇卫营太监刘元斌因“杀良冒功”被崇祯帝诛杀, 成为勇卫营重要的转折点。“杀良冒功”并非刘被杀的真正原因, 是否存在杀良冒功之事亦存疑, 这恰是崇祯朝政治气氛的独有特色。甲申之变后, 南明各政权亦设勇卫营, 但其战斗力不可与崇祯朝勇卫营相论, 且常成为各方夺权斗争的主角, 其命运与各政权兴衰息息相关, 并最终与南明政权一起灭亡。勇卫营的历史是晚明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见证了晚明政局的发展变迁, 也是晚明朝廷政治公信力崩溃的真实体现。

关键词: 勇卫营; 崇祯帝; 南明; 政治斗争

中图分类号: K248.3

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750(2024)01-0038-09

勇卫营是设置于崇祯时期的禁卫部队, 在晚明军事史上有重要影响, 其军事主官亦多卷入朝廷纷争, 影响所及, 迄于南明各朝。目前学界对于勇卫营的讨论多见于论述明代京营、宦官的学术文章中, 虽提及勇卫营之初设, 但并未对其进行过多分析。^①少数研究成果如潘星辉《明末勇卫营》一文所列史料尤为详细, 对于崇祯朝勇卫营脉络梳理得较为清晰, 但缺乏对其军事主官的考证, 对于南明各朝勇卫营的设置情况也付诸阙如。^{[1]106-122} 笔者拟爬梳相关史料, 重点关注勇卫营在崇祯及南明各政权发展的完整脉络, 军事主官及标志性事件对勇卫营的重要影响, 冀有助于丰富晚明史和军事史的相关研究。

一、京营积弊与崇祯朝勇卫营之设

勇卫营来源于明初设置的四卫营和勇士营。据方志远考证, 勇士营和四卫营出现在景泰三年(1452年), 于谦在设置团营时将四卫勇士和部分旗军抽出, 组成勇士营和四卫营。^{[2]491} 其建制沿革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节点, 就是将原本供应养马的勇士划归四卫, 马夫直接成为侍卫扈从的亲军, 一跃而成为皇帝

的心腹爪牙。弘治朝兵部尚书马文升曾认为, “勇士, 常数千人, 俱属御马监, 更番上直, 委心腹内外官统领, 其盔甲器械俱异他军。”^{[3]2308} 需要明确的是, 虽然四卫营和勇士营有明确区分, 但由于勇士营已被整体纳入四卫营中, 所以在史料中常见将两营混为一谈的记载。因此本文除特殊说明外, 也不再做严格区分, 即论及四卫营时亦包含勇士营。

四卫营发展至明末已存在颇多积弊。崇祯帝即位伊始, 曾协理京营戎政的李邦华在一则上疏中提到京营军队操练无法、战具不足, 缺乏帑金、库藏, 但开支却日益增加。^{[4]167} 樊树志指出, 京营长期以来腐败成风, 京营官军诡寄糜饷并辗转倒卖名额, 其花名册几乎都是隆庆、万历年间的名单, 实际当差的不是游手好闲之徒, 就是势家悍仆恶奴。^{[5]132} 此情形在四卫营中也同时存在, 如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 给事中姚宗文点阅四卫营, 认为四卫营的兵马数额严重不足:

官勇三千六百四十七, 仅及其半。马一千四十三, 则无至者。官旗七千二百四十, 止四千六百余。

收稿日期: 2023-11-11

作者简介: 吴志远, 河南滑县人,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蔡杰, 河南新乡人, 硕士生, 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马亦如之。^{[6]2191}

针对此种情形,崇祯帝即位后就表示“京营握重壮威,戎务急宜严飭”^{[4]169},决心对禁卫部队进行整顿。其整顿措施首先便是任用李邦华协理戎政。李邦华曾于天启二年(1622年)巡抚天津,大力整饬天津军务,颇有成效。后李遭阉党陷害,不得已称疾辞官。崇祯元年(1628年)他被起用协理戎政,并被寄予厚望,崇祯帝要求李邦华“一意整顿,务振因循,期奏绩效,用副责成之意”^{[4]169}。在李邦华的大力整顿下,京营“军容甚壮”。但因其改革触动了诸多朝臣的既得利益,“诸不逞之徒,乃构蜚语入大内”,导致“怨谤纷然”,^{[6]6844}李邦华被迫辞职,京营改革因而收效甚微。

除京营外,四卫营也进行了整顿,由提督内臣曹化淳奏改“为勇卫营,以周遇吉、黄得功为帅,遂成劲旅”^{[6]2191}。黄得功、周遇吉均出身行伍,此前曾在辽东前线立有战功,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将他们调回京师担任勇卫营将领,可见崇祯帝对勇卫营的重视。根据《明史》记载,黄得功在“崇祯九年(1636年),迁副总兵,分管京卫营”^{[6]6901},故可推测勇卫营之设也在此年。除设置勇卫营外,崇祯帝还将原京城巡捕营改名为练捕营,“亦练为战兵”,后又有“襄城伯李国桢请选京卫幼官,应袭舍人六千充护卫,名选练营”^{[7]339}。但除勇卫营外,练捕营和选练营士兵所用的都是市井无赖游民,毫无战斗力可言,只有勇卫营可备战事,所以勇卫营有“得力出京营上云”^{[6]2191}之谓。

勇卫营的设立是崇祯初年禁军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后来军事作战的表现来看,其设立和训练是颇为成功的。在京营改革因李邦华的去职而失败的同时,作为一支新兴武装力量的勇卫营开始彰显异彩,最终成为明末政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军事力量。

二、勇卫营的南北征战

崇祯朝时期,对朝廷的最大威胁,是京师以南的农民军和北方的清军(后金军)。以勇卫营应对这两大军事集团,是崇祯朝明军战斗力低下,军事局面危急的体现。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军首次入塞突至北京城下,次年五月始拔营东归;崇祯七年(1634年)七月,后金四路大军逐一突破长城隘口,蹂躏宣府、大同一带。后金军所到之处,明军多逡巡不敢战,“明之边吏震恐,未尝敢以大兵撻我锋

者”^{[8]262},甚或弃城逃跑、率先投降亦有之。^{[9]121}

崇祯六年(1633年),农民军集结于豫北太行山区,卫辉府潞王上疏告急,崇祯帝“令总兵倪宠、王朴分将京营兵,赐二将弓矢战马,监以太监杨进朝^②、卢九德驰赴南河夹剿”^{[10]187}。这是崇祯朝第一次派遣天子禁卫去征剿农民军,但是因京营将领轻信农民军诈降,各路围剿官军观望不前,所以农民军得以由滏池突破黄河天险。崇祯八年(1635年),农民军又攻克明中都凤阳,皇陵震动,对明廷造成了重大的打击。南北两大军事集团的严重威胁,充分暴露了多数明军战斗力低下的现实,崇祯帝迫切需要一支如勇卫营般能征善战的生力军投入战场,来缓解南北交困的局势。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第三次远征伐明,破喜峰口而入,明廷急忙做出反应:

遣内中军李国辅守紫荆关,许进忠守倒马关,张元亨守龙门关,崔良用守固关,勇卫营太监孙维武、刘元斌以六千五百人,防马水沿河。^{[11]1239}

这是史籍记载的勇卫营首次承担战备任务。明廷虽做了精心规划,但并未奏效,清军没有从防守严密的各口入关,而是从延庆破居庸关进逼京师。于是崇祯帝急诏各地将领入京勤王,勇卫营也被撤回入卫京师。本次守卫京师之战,明廷主要将领都被清军吓破了胆,但是勇卫营展现了其不俗的战斗力,“时勇卫营参将孙应元,游击周遇吉、黄得功战畿辅,数有功。”^{[12]560}这场勇卫营真正意义上的初战,与其他明军的怯懦畏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其赢得了良好声望。

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清兵再次破口入关。崇祯帝急召各地方部队入卫京师。此次清军远征明朝,主要活动区域在冀鲁之间。杨嗣昌提议调勇卫营向山东移动,以截住清军归路,并特意强调要“以勇卫督理刘元斌、卢九德协援奏功”^{[13]681}。在山东,勇卫营与清军交战小有斩获,“斩级六颗、获马骡二十四匹”,这份战功在与其他明军皆是败报的对比下,显得殊为亮眼。兵部在事后叙功时也称:“捷报所失较所得不啻十倍过之,本不宜论叙,但均奉有叙恤之旨,若事后一概抹杀之,恐于信赏有碍。”于是决定给予勇卫营将领黄得功、孙应元、宋纪、张一龙、张琦、张应乾应准纪录,各赏银十两的奖励。^{[14]1548-1552}此战后,勇卫营被调回京师防御。

崇祯十年(1637年),杨嗣昌任兵部尚书后向崇祯帝提出了著名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须派

一支军队赴豫、楚前线。这年八月间,农民军攻陷六合,扬州岌岌可危,勇卫营将领孙应元、黄得功、宋纪、张一龙等主动请缨,杨嗣昌认为“诚可资杀贼之用”^{[13]409}。但杨仍有些顾虑,毕竟勇卫营是天子扈从亲军,是否适合征调征剿农民军?但迫于形势,加之上述将领异常坚定,杨嗣昌遂奏报:

各将恳请不已,谓此兵原非额设,由近年创议训练而成,情愿杀贼报效,如敢违节制,即请立军令状于本部前。而粮餉所费不多,辎重种种夙备,一往无前,誓不反顾。其志愿如此!^{[13]409}

当年八月,崇祯帝果断做出决策,让太监刘元斌、卢九德统率勇卫营前去扫荡流寇。他还亲自巡城整肃军纪、加强城防,并为勇卫营壮行,“躬自阅城……五军、神枢、勇卫、前锋营鞞首弓韃伏道旁,以一营树一羽纛,铠甲旌旗甚设”^{[15]24}。九月,勇卫营一万两千人开赴江北讨伐农民军。^{[16]188}十月,勇卫营首先在舒城取得大捷,“太监刘斌^③率京营兵鏖战竟日,追杀七十余里,号哭震天,杀贼五百四十二级,贼遁入山”^{[9]229}。十一月^④,农民军十五六万人集结于河南光山、固始、商城一带,卢九德率将领黄得功、宋纪追捕,在战斗过程中“山下积雪,马不能驰,方收兵,贼大至,四面合围,兵溃。”^{[16]193}勇卫营此次出剿以来,一胜一负。

崇祯十年底至十一年(1638年)间,勇卫营主要在河南战斗,战果颇著,“(孙应元)大破贼郑州,再破之密县,先后斩首千七百”^{[6]6921}“太监刘元斌击混十万等,战于罗山,斩级千七百”^{[16]194}。太监刘元斌两次向朝廷汇报张献忠愿意受抚,^{[17]92-93}张献忠势蹙求抚,显然是受到了勇卫营进剿带来的军事压力。同月,刘国能也向明廷乞降。张献忠、刘国能的求抚,对其他农民军首领产生了不良影响,在他们之后,又有十多家农民军首领相继投降。这个时期是被顾诚称为“明末农民战争一度转入低潮”的时期,恰也是勇卫营大放异彩的时期。崇祯十一年二月,卢九德率兵“大败贼于山石桥,擒贼抵地虎、黑旋风等”^{[9]241};“太监刘元斌击混十万等贼于堰城……总兵黄得功击贼光山、固始间,四日三胜……又大破贼于舞阳”^{[16]197};六月,“太监刘光(元)斌、卢九德报遂平解围,斩获三千余”,勇卫营将领孙应元、黄得功又与其他地方部队配合,经三天两夜,连战五十多场,在南阳唐县大败农民军;^{[16]202-203}七月,黄得功又率勇卫营在遂平城南击败农民军。^{[16]204}勇卫营在河南的多次胜利,是当年农民战争一度转入低潮的现实原因

之一。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二三月间,清兵撤出关外,征剿农民军再次成为首要议题。曾为张献忠求抚的勇卫营太监刘元斌也一改抚议,倡言“终必图贼,始免后忧”^{[13]765}。五月,明廷对勇卫营此前出征河南的功劳进行表彰:

进孙应元左都督,黄得功太子少师,各锦衣卫副千户世袭,宋纪右都督,张一龙都督同知,各世百户。^{[18]5842}

与此同时,蛰伏一年之久的张献忠复叛,罗汝才闻讯也起兵响应张献忠。杨嗣昌闻讯,马上调发勇卫营开赴南阳、汝宁一带,阻断农民军东北之路。^{[13]786}八月,勇卫营在河南淅川大败农民军,击退老回回(马守应),收服改世王(许可变)、安世王(胡可受)。^{[16]218}十月,杨嗣昌督师襄阳,与勇卫营太监刘元斌等人会商军事,确定了勇卫营接下来的军事部署主要以驻防为主,同时协剿周边的农民军,“总兵孙应元驻扎襄阳,总兵黄得功驻防光化,其副总兵张一龙调往荆州,周遇吉暂驻新野”。^{[13]837}杨还奏报“勇卫京营之兵自成一股,重势弹压,消弭所资不少”,建议崇祯帝“勿轻撤回”^{[13]838},显示了勇卫营在征剿农民军行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后,勇卫营分为两支,集中在驻地周围活动。一支由太监刘元斌率领,辖孙应元、周遇吉、黄得功等部,主要在南阳府与襄阳府交界地带活动,主要目的是守护显陵。《明史》载“遇吉乃从元斌驻荆门,专护猷陵”^{[6]6899}“及杨嗣昌督师襄阳,令元斌、应元戍荆门,护猷陵”^{[6]6922}。另一支则由太监卢九德率领。此前张献忠、罗汝才复叛之时,卢九德并未跟随勇卫营南下,此次南下当是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初^⑤,而黄得功则被调往河南,隶于卢九德麾下。此后卢九德部勇卫营大致以豫皖交界处为主要活动地,主要职责是守护中都。卢九德所部与刘元斌所部分别获板石畷与丰邑坪大捷,取得了降服贺一龙、混世王、小秦王,大破罗汝才的战绩,^⑦丰邑坪大捷更是被颂为“荆楚第一功”^{[6]6922}。八月,贺一龙复叛,突犯霍山、太湖一带,刘元斌率勇卫营六千人征讨,“合皖豫兵讨之,破贼于霍山”^{[18]5873}。此中“皖豫兵”就包括卢九德率领的勇卫营,这当是刘、卢两部勇卫营分离近一年以来的第一次并肩作战。此后,刘元斌和卢九德所部勇卫营分别屯驻在鄂东、皖西一带,进则合兵进剿河南,退则分兵守卫二陵。

崇祯十五年(1642年),勇卫营太监刘元斌被弹

劾有“杀良冒功”之罪而被逮诛杀,其部勇卫营归王承恩率领。^{[18]5934}此后勇卫营除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曾因昌平兵变出剿之外^{[7]340},其余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京城^⑧。而卢九德部勇卫营则一直在凤阳祖陵周围驻扎,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归入南明弘光朝廷。

对比勇卫营与清军和农民军的作战情况,可见勇卫营在对抗清军时远不及对抗农民军显得游刃有余。从作战方式上看,勇卫营与清军作战常是以被动防御为主,而与农民军作战则是主动出击。崇祯十三年后刘部勇卫营和卢部勇卫营承担守护显陵和中都的任务,但其驻扎地并不固定,活动范围比较广泛;从所获战果上看,勇卫营与清军作战的战果并没有如农民军作战显著,比如崇祯九年与清军交战并未见杀贼记录,崇祯十一年吴桥战清军只是杀贼六人、俘获骡马二十四匹,这与征剿农民军的战果显然无法相比。但若对比勇卫营与明军其他部队,足以显示其战斗力之强悍。

三、刘元斌被杀案及其深层次原因

崇祯十五年勇卫营主官刘元斌被诛杀,是该组织军事上的重要转折。刘元斌虽为宦官,但久历战阵,颇为知兵,其被杀无疑是勇卫营的一大损失,也可被视为明廷自毁长城之举。刘元斌死后,其部勇卫营被安置在京城,不再发挥抵抗农民军的作用。就在刘元斌被诛杀当月,农民军革、左五营北上与李自成、罗汝才部汇合,“十月初三日流寇老回回、左髻王、格料雁、一斗谷等由固始、新蔡而来,如风雨骤至”^[19],随即攻克汝宁。自此,河南大部均为农民军占领,为此后推翻明朝统治奠定了基础。^{[20]167-168}而若刘部勇卫营仍能在鄂东驻扎,革、左五营未必能顺利与李自成、罗汝才部汇合。刘元斌被杀不仅充分地反映了崇祯帝的性格特征,也展示了明晚期复杂的政治氛围。

崇祯十五年七月,御史王孙蕃弹劾刘元斌“监禁军南讨,拥兵不战,班师过山东,焚劫淫污,杀良冒功,欺蔽不法”^{[21]112},崇祯帝闻言大怒,立即逮刘元斌下狱问罪。十月判刘元斌斩立决。^{[21]118}王孙蕃所纠刘元斌拥兵不战事,《豫变纪略》中记载颇详^⑨:

太监卢九德、刘元斌率禁旅平贼,元斌次归德四十余日不进……诸将多养寇以自封,而刘元斌、左良玉为最,动日朝廷善负人,贼既尽,何所用我,不如且留贼为富贵资。故不肯杀贼,每相遇,特稍稍

斩获以报功而已。元斌追贼至归德,贼新创,踉跄西走。使其穷追,则草薶而禽狝矣。元斌屯兵于归德之东门者四十余日,劫掠数十里,与贼无异,但不放火焚屋耳。且索赂甚急,声言欲攻城,城中樵苏皆断。士大夫无可奈何,醵金赂之,乃去。^{[22]168}

上述史料指责刘元斌在河南屯兵不进,且纵兵劫掠、杀良冒功。此外,刘元斌所部“闻上命御史清军,京军悉沉所掠妇女于河”,且因“观望不前”致使“藩封失陷”^{[16]258,259}。而所谓刘元斌在山东劫掠乃至杀害良民之事,则除王孙蕃的奏报外,并未见有其他记载,惟“冒功”一事,似有所属。崇祯十二至十三年间,山东人李青山啸聚梁山泊为乱,朝廷屡次进剿皆未能彻底剿灭,至崇祯十五年才被彻底击溃,据《绥寇纪略》载:

十五年正月六日,兖东防守都司齐见龙,报其弟齐翌龙生擒青山以献。先是,青山以百骑走泗水,材官杨衍者,故将御蕃姪也,杀其骑且半,逐之至费县东之箕山,杨相射中其马,翌龙遂得而生擒馘之。援剿禁旅太监班师入都者,曰刘元斌,于中道诡称搜解青山余党,欲以自为功。^{[23]376}

刘元斌欲夺他人功劳冒为己功,或许是刘元斌被弹劾的原因。如此看来,刘元斌实在是罪大恶极。此案看似铁证如山,但其中确有一些需要破解的疑点。

首先,勇卫营的军纪问题。按王孙蕃的奏报,勇卫营将领纵兵劫掠、杀良冒功,其军纪应该极坏,但考察相关史料,却有截然相反的记载。《三垣笔记》中提到“刘内臣元斌尝监京军讨贼,过雄县,纪律颇严”^{[24]192}。明末诗人朱芾煌于崇祯十一年冬路过南皮,正好遇见勇卫营在此驻扎,宋纪、张一龙留朱芾煌在军中留宿,朱遂写下《东方行赠宋张两将军因南皮投营款留感而成歌》,诗中有“军容监使无足言,介胄脱略其相忘”,“马上红旗立待发,阵前铁甲明如霜。须臾斫营白刃接,意气慷慨犹安详”^{[25]28}等句。朱在《务关》一诗中,还描述勇卫营“赫赫观军容,方略向何处”^{[25]20}。这些对勇卫营军容的描写,也可侧面反映出勇卫营的军纪严明。

其次,评价一支军队的军纪状况,也可从其主要将领入手分析。勇卫营作为“天子爪牙”,同地方军阀部队差别明显,不仅将领较少跋扈,并且还表现出忠君为国的品质。如主要将领孙应元在崇祯十四年的罗山大战中战歿;周遇吉改任山西总兵后,在崇祯十七年的宁武关大战中阖门战死,李自成部下也

不禁称赞“周总兵真好汉”^{[19]441}；黄得功长期镇守南畿，清军攻破南京后，在与清军的作战中中箭受伤，黄得功“掷刀拾所拔箭刺吭死。其妻闻之，亦自经”，黄得功“其军行纪律严，下无敢犯，所至人感其德。庐州、桐城、定远皆为立生祠”^{[6]6903}；勇卫营副将张一龙也有“善驭兵”的名声，尝有士兵叛乱，张一龙“追获尽斩之，一军肃然”^{[6]7531}。由此可见，勇卫营主要将领皆是忠君爱国之人，对于军队的约束也比较严格。勇卫营被弹劾纵兵杀人，其可信度较低。

再次，刘元斌案与王裕民案的关系。根据王孙蕃的奏报，刘元斌乃王裕民名下得力干将。王裕民曾因追随宦官王安，在天启朝受到牵连，“（王安）名下曹化淳、王裕民、马应辰等，各降责有差”^{[26]141}。崇祯帝即位后，先启用王裕民镇守中都，后又使王裕民总督京营，成为权倾一时的大档。按王孙蕃所云，刘元斌乃王裕民名下干将，刘元斌在山东搜剿李青山余党欲冒为己功，正是王裕民为其上疏奏功。^{[23]376}刘元斌被王孙蕃弹劾，也是王裕民先给刘元斌通风报信，刘元斌得以上疏辩解。但王之所为触怒崇祯帝，于是王孙蕃再次上疏弹劾，“裕民暗泄臣疏，故元斌得按款强辩，不然，本系密封下科，未尝钞传，元斌何以知之？”^{[24]192}崇祯帝立即将王裕民下狱论罪，并敕令“刑部三日内拟奏”^{[21]118}。时任刑部尚书的徐石麒先拟定戍王裕民烟瘴之地，显然不合帝意，崇祯帝“怒其失出”，认为“此奴钱神有灵，譬百足之虫，至死不僵”^{[27]517}，不仅对王裕民深切厌恶，甚至还怀疑徐石麒也被其收买。后虽经刘宗周开解，崇祯帝才稍稍缓和，但最终仍“令石麒改谏词，弃之市”^{[6]7041}。由此看来，似乎王裕民是受刘元斌一事牵连而惹祸上身，但这并不符合历史真相。

崇祯帝即位伊始，就通过钦定逆案将魏忠贤一党一网打尽，并禁止大臣交通宦官干扰朝政，撤销各边镇守太监，但不久又重新授予太监典兵之权。曾有人分析自崇祯十三年至崇祯十六年三月，崇祯帝大力削弱宦官力量，而诛杀刘元斌就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28]就在诛杀刘元斌前，崇祯帝曾告诫东厂太监王德化“非谋反逆伦权豪扞法者勿问”，又罢内操，撤监军，并且以“刘元斌、卢九德讨贼不效”，令其“班师入都”，虽然最终又否决了刘元斌、卢九德还京的打算，但仍达到了“厂卫亦以大体裁抑”的效果。^{[29]13-14}这场以削弱宦官势力为目的的一系列举动虽是由时任内阁首辅的周延儒倡议，但周是迎合上意，其门生杨士聪曾对此评价道：

初，义兴^⑩（周延儒）之再相也，刻意为正人正事，乃未几罢内操，罢厂卫，又未几而诛王裕民、刘元斌，凡上之所以信义兴与义兴之所以为上信任者，无一不与中贵为难。故左右之人有短义兴者，言无从而入，即使得入，而上之信任转坚。^{[18]6038}

杨士聪作为周延儒门生，对于周延儒“笔墨之间，颇为回护”^{[30]1225}，但是也无所避讳地点出周延儒善于迎合上意的特点。所以表面上看，是周延儒提出要裁抑宦官权力，但实际上乃是崇祯帝早有此意，只不过借周延儒之口说出而已。而周延儒亦不甘心总为皇帝利用，其深知决不能与宦官集团全面决裂，需要留出余地，所以其虽然“撤监军内操”，却仍然“与中官往来顾厚”^{[31]418}。事实上，在朝廷中与周延儒交好的就是司礼监太监王裕民。

盖延儒之入，王内臣裕民有力，其罢厂卫，亦有力。已，以祖制，并罢裕民所管京营，裕民恚为延儒所卖，延儒亦惧为中伤，乃托所善董心葵调停，阴还厂权。^{[24]184}

由此可见，在周延儒阴承崇祯帝之意而对宦官集团大加削夺之时，背后居然又与王裕民私下达成和解，并未削弱王裕民的权力，以达互相成就之效。而王裕民作为皇帝近臣，屡犯忌讳，不仅交结外廷，还屡屡泄露朝廷机要。前述王裕民向刘元斌通风报信即是一例。王裕民还经常向文选郎吴昌时泄露机密，吴昌时则借此揣度崇祯帝旨意，向别人收取贿赂，吴昌时后来被御史揭发，下狱论死。^{[6]7930}此外，兵部尚书陈新甲亦“与王司礼裕民昵”^{[24]191}，后陈新甲因泄露崇祯帝暗中命其与清朝议和之事，被崇祯帝处死。周延儒时为内阁首辅，竭力为陈新甲开脱，但终究无济于事。

综合以上史料可见，在崇祯十四年至十六年的朝廷中，形成了一个以司礼监太监王裕民、内阁首辅周延儒、督理勇卫营太监刘元斌、兵部尚书陈新甲、文选郎吴昌时等人为主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的核心其实是宦官王裕民。王裕民身居禁中，为皇帝心腹且身负总督京营的要职，他交结兵部尚书，还与在外征战的勇卫营太监刘元斌交往甚密，自是大忌，于是崇祯帝急欲铲除这个团体。在决定杀王的前一日，崇祯帝曾密召周延儒，“尽屏左右，而所及不过泛语，五鼓弃裕民市，而宜兴始知”。崇祯帝此举帝王心术表露无遗，他想让太监们误以为周延儒“实赞帝杀之（王裕民）”，于是太监们“以此恨刺骨，而其过日闻于上矣”^{[31]418}。如此一来，崇祯帝不

仅能杀掉王裕民,还有机会借此铲除周延儒,“裕民之死,以比陈司马新甲匿塘报,上借事杀之”^{[24]192}。可见王裕民才是这个团体的核心,刘元斌身在集团当中,与王裕民的关系就决定了其命运,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元斌纵兵淫掠、“杀良冒功”的罪名是存疑的。在刘元斌一案中,看似是王裕民受刘元斌牵连而死,但实则相反。

崇祯帝自以为对刘元斌、王裕民的处理恰当,却不知实乃作茧自缚,致使众叛亲离,清代史家曾论及此事:

主上之且信且疑,王裕民、刘元斌未能免于刑戮,虽恩礼弗改,将必有以大失其心,一遇危急,即涣然离矣。彼杜勋首恶,固在先降,人有谓王裕民名下太监王则尧开齐化门以纳贼,即云流言讹伪,诘尽无其端哉?^{[29]16}

从崇祯三年(1630年)袁崇焕被杀、崇祯五年(1632年)孙元化被杀,到崇祯十五年诛杀陈新甲,再到崇祯十六年赐死周延儒,帝“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6]7948}。崇祯帝刚愎自用、残忍多疑的性格决定了崇祯朝的政治气氛,而刘元斌的被杀,也成为勇卫营重要的转折点。

四、南明各政权下的勇卫营

刘元斌部勇卫营虽已于崇祯十五年后不再派往地方,但卢九德部勇卫营则一直在中都至南京一带驻扎,并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崇祯十五年,马士英被起为凤阳总督后,常与卢部勇卫营一起进行军事行动,如当年讨平刘超叛乱^⑧,第二年与勇卫营协同防守南京,显然双方已经结成军事集团。马士英与卢部勇卫营的关系,对弘光朝廷的建立产生有重要影响。甲申之变后,史可法曾与马士英暗中谋划迎立桂王,但就在“已拟仪郎戒乘輿法物往粤”迎接桂王之时,马士英得知卢九德联合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合谋拥戴福王,于是马士英不得不“隐其前说,且乞附盟”^{[32]364-365}。卢九德之所以倾心于福王,乃是因卢出身于福藩旧邸,“卢瑄者,幼常给使恭皇帝,宫号‘胎里红’者”^{[32]365}。卢九德之所以有定策之权,则是因其身为勇卫营太监,手中握有兵权,随即联合其他地方军阀拥立福王,史载“时南中咸知主兵者定义”。福王即位后,以定策之功授予卢九德等人恩典,令卢九德总督京营。^{[33]449}

弘光朝继续设置勇卫营,总人数为一万五千

人。^{[18]6167}弘光朝勇卫营建制与崇祯朝略有不同,首先是弘光朝勇卫营分为水陆两军,“前军都督府同知徐大受领陆兵。进郑彩总兵官,领水兵”。此外,弘光朝勇卫营不仅由太监李国辅监督,也要“听司礼监太监韩赞周节制”^{[18]6105}。李国辅是韩赞周的养子,但韩赞周似乎名义上节制勇卫营,除有功一体优叙外,并未见插手军务。马士英在朝中常常引导弘光帝寻欢作乐,而李国辅则“从容泣谏”,为马士英所恨,马士英于是计划夺其兵权。^{[33]214}浙赣交界处有一山名为云雾山,自正统年间就一直被封。弘光元年(1645年)二月,有人向弘光帝建议开采云雾山以饶国库,于是弘光帝命李国辅前往勘视。^{[34]8}但这其实是马士英的调虎离山之计。马趁李外出勘验期间,夺其勇卫营兵权,《明季南略》记载:“国辅提督勇卫营,操练禁旅,及奉命往浙,士英竟夺营篆,授其子马锡。”^{[9]168}就在弘光朝廷上下争权夺利之际,清兵已经兵临城下,南明弘光政权仅存在一年即不旋踵而亡,马锡被清军斩杀,弘光朝勇卫营也以覆灭而告终。^{[35]48}

弘光二年(1645年)闰六月,朱聿键在福州即皇帝位,改元隆武。关于隆武朝勇卫营的记载甚少,只能从寥寥无几的史料中推测其情形。史载“绍宗幸闽,陈有功提督勇卫营”^{[36]460},陈有功曾护卫隆武帝入闽,乃是扈从功臣之一,所以被授予提督勇卫营的职务。隆武元年(1645年)十一月,抚州告急,隆武帝命张家玉、陈有功等率军解围,张家玉在许湾大败清军,陈有功却于此战中战死。与弘光朝勇卫营相比,隆武政权不再由太监提督勇卫营。许湾战后,隆武朝勇卫营则不见诸记载。隆武二年(1646年)八月,隆武帝于汀州遇害,“汀州之变,京营溃散”^{[36]462},隆武朝勇卫营当亦于此时覆灭。

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月,桂王朱由榔监国肇庆,十一月即位为帝,是为永历帝。永历朝亦设勇卫营,永历元年(1647年)七月,一则奏疏中提道:

本月十七日,总督勇卫禁旅、军前总兵官、右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张肃,自武冈赍到皇上所颁敕谕四道……^{[37]71}

这表明永历朝勇卫营至迟设于当年七月之前。同年八月,清军进攻永历帝驻蹕的武冈州,当地军阀刘承胤却向清军表示愿意献出永历帝投降,永历帝得知此消息,匆忙出城逃难,连乘輿法驾都来不及带走,全部丢弃在武冈。而太监庞天寿一直扈从永历帝周围,“随上自武冈走柳州,蒙尘苗峒中,天寿

与马吉翔皆有劳勩”，由此获得永历帝信任，得以“赐一品服，提督勇卫”^{[33]217}，此后勇卫营一直为庞天寿所控制。由于永历朝廷辗转流徙，军饷不继，勇卫营的开支一直由“庞天寿私资供饷”^{[36]451}，勇卫营俨然由皇家禁卫变为庞天寿的私人部队。

与南明诸政权相比，永历朝勇卫营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庞天寿长期提督勇卫营，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庞天寿早在崇祯二年前后就已受洗。^[38]永历四年(1650年)，他曾致信教皇英诺森十世(Innocent X)，信中其头衔为：

大明钦命总督粤闽，恢剿联络水陆军务，提调汉土官兵，兼理财催饷，便宜行事，仍总督勇卫营，兼掌御马监印，司礼监掌印太监鹿亚基楼契利斯当。^{[39]1549}

其中“亚基楼契利斯当”(Achil-leus Christao)乃是庞天寿教名。《永历实录》载“天寿事天主教，拜西洋人瞿纱微为师。勇卫军旗帜皆用西番书为符识，类儿戏”^{[33]218}。永历朝的三护卫，分别为“李元允督禁旅，庞天寿督勇卫，吉翔督戎政”^{[33]209}，但其护卫跟随永历帝随处播迁，毫无训练，自然没有战斗力。永历四年十一月，尚可喜、耿继茂率军攻陷广州，孔有德占领桂林，身在梧州的永历帝再次逃跑，身边只有“勇卫、戎政二营及溃亡之卒扈从移蹕”。永历帝到达南宁后，勇卫营提督周金汤纵兵焚烧梧州，“庞天寿仍提督勇卫营，将土物故殆尽，京营益不振”^{[36]462}。庞天寿与马吉翔相互勾结，欲逼迫永历帝禅位给孙可望，孙可望恐人心不服，未敢行篡位事，但下令“凡朝廷内外机务，惟执事力为仔肩。若有不法臣工，一听戎政、勇卫两衙门参处，以息纷嚣”^{[33]449}。实际上朝廷大事都是由孙可望裁定。永历十年(1656年)，永历帝摆脱孙可望的控制，由李定国迎入昆明，庞天寿亦随入滇，后竟忧病而死。永历帝入滇后又被李定国所控制，“李定国以兵充禁旅，三扈卫名存而实亡”^{[36]462}。自庞天寿而后，史料中均不见关于永历朝勇卫营的记载，当是与其再难以对朝政发挥作用有关。永历入缅后，缅甸当局永历十五年(1661年)发动“咒水之难”，将永历帝身边包括马吉翔在内的扈从官员几乎一网打尽，“禁旅将士尽死”^{[36]462}，勇卫营应当亦覆亡于此。

五、结 语

勇卫营诞生于明末内忧外患之际，是改前朝四卫、勇士二营而来，其身为天子禁卫，却不以出警入蹕为任，而常常出征地方，北御清兵南征流寇，寄托

着崇祯帝的中兴之盼。崇祯朝勇卫营的主要将领多是能征善战之辈，其出征多所斩获，并逐渐成长为一支劲旅。以勇卫营应对这两大军事集团，是崇祯朝明军战斗力低下，军事局面危急的体现。勇卫营对农民军的军事打击效果明显，并迫使大量农民起义将领归附朝廷。虽然勇卫营对清军战果无法与追剿农民军相比，但其战斗力明显强于同时期其他抗清明军。

崇祯十五年勇卫营太监刘元斌被杀，是勇卫营发展的重要节点。刘元斌被杀不仅充分反映了崇祯帝的性格特征，也展示了明晚期复杂的政治氛围。崇祯帝诛杀刘元斌，主要目的是为了摧毁以王裕民为核心的政治团体。崇祯帝先诛杀刘元斌，又借刘元斌之事杀王裕民，后杀吴昌时、周延儒，终于铲除了这个团体。但自刘被杀后，勇卫营军事上遂无大作为。

南明各政权亦设勇卫营，但实为弱旅不复荣光。此时期的勇卫营，大多成为地方军阀相互勾结，夺取政治权利的工具。宦官控制勇卫营的习惯，也变为权臣和地方士绅。勇卫营随着南明各政权的覆灭而灭亡，中兴大明亦成空话。南明各政权的勇卫营之设只是崇祯朝的制度惯性，并未见其对政权的存续有何积极作用。勇卫营见证了晚明政局的发展变迁，其最终的溃败与覆亡，亦与明廷的终结相始终。

注 释：

①此类文章有志志远：《明代的四卫、勇士营》；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辑组：《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91-499页；曾磊：《浅析明崇祯时期的京营》，《历史档案》2018年第3期；周晓光：《论明代崇祯年间的宦官》，《学术月刊》1992年第1期。

②一说为杨应朝。如《绥寇纪略》云：“帝特命倪宠、王朴为总兵，以京营兵六千，监以太监杨应朝、卢九德。”引自吴伟业：《绥寇纪略(附补遗)》卷一《澠池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页。

③“刘斌”当为“刘元斌”之误。

④《怀陵流寇始终录》将这次光山战役的发生时间定在崇祯十年，但《明季北略》《流寇志》记载此役过程与《怀陵流寇始终录》大致相同，不同的是《明季北略》《流寇志》二书记载此役发生于崇祯九年十一月。按：崇祯十年八月，勇卫营请行时，杨嗣昌尚有天子扈从是否应当派往地方征战的顾虑，如果勇卫营在这之前已经有出征地方的经历，那么杨嗣昌是不应当有此顾虑的，所以勇卫营在崇祯九年就在

河南战斗是不大可能的,应是《明季北略》《流寇志》误记。

- ⑤“猷陵”当为“显陵”之误,以下不再指出。
- ⑥有史料表明,崇祯十三年闰正月卢九德从京师南下到达临清,“臣已督率官兵于十九日抵临清,沿途军民相安,士卒共跃”。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辛编》第五本《兵部行“御前发下征剿流寇督理勇卫营□九德题”稿》,第973页。
- ⑦关于板石吸大捷,《明史·黄得功传》与《明纪》中皆有记载,见(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六十八《黄得功传》,第6901页;(清)陈鹤:《明纪》卷五十五《庄烈纪四》,第577页。关于丰邑坪大捷,《绥寇纪略》记载颇详,见(清)吴伟业:《绥寇纪略(附补遗)》卷七《开县败》,第144页。
- ⑧刘元斌被杀后,开始出现勇卫营在京城驻扎的史料,而有关勇卫营的史料明显可分为京城勇卫营和地方勇卫营,后者皆与卢九德有关。因此可推断,驻扎京城的勇卫营当是原刘元斌部下。有关勇卫营在京驻扎的史料,可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3册《兵部为勇卫营提督王承恩酌议勇卫兵丁宜由两班分为四班并有旨事行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1-304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辛编》第十本《兵部行“兵科抄出总督勇卫营太监会王题”稿》《兵部行“兵科抄出京营总督吴题”稿》,第1869、1924页。
- ⑨《豫变纪略》记此事发生于崇祯十三年十二月,并言“至十四年,帝始廉得其状而诛于市”,《国权》《怀陵流寇始终录》则系时于崇祯十四年十月。按《豫变纪略》中所言“命卢九德、刘元斌率其禁旅入豫平贼”,当对应《怀陵流寇始终录》中“太监刘元斌率京军援河南,闻南阳陷,引兵北去”之事,而农民军陷南阳发生于崇祯十四年十一月,所以当以《国权》《怀陵流寇始终录》所载时间为确。
- ⑩按《明史》载“周廷儒,字玉绳,宜兴人”,故此“义兴”当为“宜兴”之误。见(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八《周廷儒传》,第7925页。
- ⑪崇祯十五年十一月,被调往支援开封的总兵官刘超占据永城造反,崇祯帝“命士英偕太监卢九德、河南总兵官陈永福进讨”,最终刘超被马士英用计擒获,槛送京师(一说为黄得功擒斩)。

参考文献:

- [1]潘星辉.明末勇卫营[M]//中国明史协会.明史研究:第7辑.合肥:黄山书社,2001.
- [2]方志远.明代的四卫、勇士营[C]//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辑组.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 [3]明孝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4]李邦华.水文李忠肃先生集[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5]樊树志.崇祯传[M].北京:中华书局,2021.
- [6]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7]王世德.崇祯遗录[M]//《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中国野史集成:第28册.成都:巴蜀书社,1993.
- [8]清太宗文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9]计六奇.明季北略[M].任道斌,魏得良,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0]文秉.烈皇小识(外一种)[M].北京:文津出版社,2020.
- [1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2015.
- [12]陈鹤.明纪[M].上海:世界书局,1935.
- [13]杨嗣昌.杨嗣昌集[M].梁颂成,辑校.长沙:岳麓书社,2008.
- [14]“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辛编:第8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5]万斯同.明史[M]//续修四库全书:第3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6.
- [16]戴笠,吴旻.怀陵流寇始终录[M].陈协棻,刘益安,点校.沈阳:辽沈书社,1993.
- [17]杨山松.孤儿吁天录[M]//中华书局.明杂史十六种: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8]谈迁.国权[M].北京:中华书局,1958.
- [19](顺治)沈丘县志[Z].清顺治十五年刻本.
- [20]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 [21]彭孙贻.平寇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22]郑廉.豫变纪略[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23]吴伟业.绥寇纪略(附补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4]李清.三垣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5]朱芾煌.文嗜堂诗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集部:第19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 [26]文秉.先拔志始[M]//彭遵泗,等.蜀碧(外二种).北京:文津出版社,2020.
- [27]万斯同.明史[M]//续修四库全书:第33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6.
- [28]周晓光.论明代崇祯年间的宦官[J].学术月刊,1992,(1):53-59.
- [29]法式善.陶庐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1]赵吉士,辑撰.寄园寄所寄[M].周晓光,刘道胜,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8.
- [32]姜曰广.过江七事[M]//李逊之,等.三朝野纪(外四种).北京:文津出版社,2020.
- [33]王夫之.永历实录(外一种)[M].北京:文津出版社,2020.
- [34]温睿临.南疆逸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5]刘献廷.广阳杂记[M].汪北平,夏志和,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57.
- [36]钱海岳.南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37]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苏州地方史研究室.瞿式耜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38]董少新.明末奉教太监庞天寿考[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5-44,73.
- [39]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M].朱杰勤,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03.

The Dusk of the Palace Guards: A Study of Yongwei Guard During the Chongzhen Dynasty and the Nanming Regime

WU Zhiyuan, CAI Jie

(School of Hist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Yongwei Guard wa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Chongzhen dynasty, and was adapted from the Four Guards Camp and the Warrior Guards. It was a key part of the reform of the capital camp after the accession of Emperor Chongzhen. Although the Yongwei Guard was known as the Emperor's Forbidden Guard, it had been fighting in all directions all year round, either defending the Qing army in the north or conquering bandits in the south, with remarkable results. It was an important military force relied on by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fifteenth year of the Chongzhen of the Ming dynasty (1642), Liu Yuanbin, the eunuch who ruled the Yongwei Guard, was executed by Emperor Chongzhen for his "killing people for gather Greedy work", which became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for the Yongwei Guard. The true reason for Liu's murder was not the act of "killing people for gather Greedy works". It was also questionable whether there was any such act, which wa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of the Chongzhen dynasty. After the Jiashen Rebellion, various regimes in the Southern Ming dynasty also established Yongwei Guard, but their combat power could not be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Chongzhen dynasty, and they often became the protagonist in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mong all parties. Their fat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various regimes, and ultimately perished together with the Southern Ming regime. The history of Yongwei Guard w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witnessing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also a true reflection of the collapse of the political credibility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Yongwei Guard; Emperor Chongzhen; the Southern Ming dynasty; political struggle